

戰後在日台籍日本兵的戰爭記憶敘事*

—— 以磯村生得的相關文本為例

王惠珍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摘要

本論文以磯村生得（本名：柯生得）在日以「日語」書寫的戰爭記憶文本《失落祖國的人》和《少年上戰場》為題材，探討他如何借用「日語」重述個人的生命記憶和建構台籍日本兵參戰的集體記憶。首先，介紹說明戰後台灣社會有關台籍日本兵返台的相關報導。其次，釐清磯村的日語寫作與在日台籍日本兵求償、訴訟運動的關聯性，可知個人的參戰記憶在不同的文本，複述的方式皆有差異。最後，探討磯村生得《少年上戰場》與高宮亨二《消失在呂宋》內容的重疊性，共構戰爭記憶的問題。同時，指出這本非虛構寫實的小說，如何重構台灣殖民地戰中世代南洋參戰的集體記憶及其特殊性。肯定它在戰後台灣日語文學裡作為戰中世代見證性的意義，與其完成階段性任務的價值，是台灣後殖民的記憶政治論述中，不可忽略的文化記憶。

關鍵詞：台籍日本兵、日語、戰爭、集體記憶、建構、文化記憶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計畫「台灣戰中世代作家戰爭敘事中的文化記憶」（MOST110-2410-H-007）之部分研究成果，在此誌謝。

Post-war Narratives of Taiwanese-Japanese Soldiers' War Memories in Japan:

A Case Study of Ishimura Ikuru's Relevant Texts

Wang Hui-Che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works of 磯村生得 (Isomura Seito) (real name: 柯生得 (Ke Seito)), written in Japanese, titled “People of the Lost Homeland” (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或る台湾人軍属の記録) and “Youth on the Battlefield,” (少年達の戦場—台湾人元軍属の挽歌)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the writer employs the Japanese language to re-construct the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aiwanese soldiers from World War II. Firstly, it introduces and explains related reports from post-war Taiwan regarding the return of Taiwanese soldiers from Japan. Secondly, it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omura's Japanese writing and the movement for compensation and litigation by Taiwanese soldiers in Japan, reveal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narration of personal war memories across different texts. Finally, it examines the overlap between Isomura Seito's “Youth on the Battlefield” and 高宮亭二 (Takamiya Teiji)'s “Disappeared in Luzon” (ルソンに消ゆ) to discuss the issue of constructing war memories. Additionally, it highlights how this non-fictional realistic novel reconstruct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Taiwanese generation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war in the South Seas and emphasizes its significance as a testament of the wartime generation within Taiwanese Japanese literature.

By affirming its value within the discourse of post-colonial memory politics in Taiwan, it underscores a crucial aspect of cultural memory that cannot be overlooked.

Keywords: Taiwanese Soldiers in World War II, Japanese, War, Collective Memories, Construction, Cultural Memory





戰後在日台籍日本兵的戰爭記憶敘事

—— 以磯村生得的相關文本為例

一、前言

中日戰爭爆發後，台灣青年分別在各個時期以不同名義投入戰場，大致可分成：軍夫時期（1937.07-1941.02）、志願兵時期（1941.12-1944.09）、徵兵時期（1944.09-1945.08）。¹1939年5月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揭櫫治台三大方針「工業化、皇民化、南進化」，在台大力推動皇民化運動，台灣成為帝國南進的基地，支援帝國擴張所需的勞動力和通譯人才等，然而隨著日本戰敗，有些台灣軍屬因而淪為「戰犯」，接受盟軍審判入監或命喪異鄉者皆有之。²根據統計，在太平洋戰爭末期，台籍青年以各種身分被遣送至南洋地區者，高達二十多萬人，戰病死者則多達三萬多人。³其中，軍人和軍屬身分的戰病死人數相差極大，死者以軍屬居多，他們儼然成為日軍在南洋戰場上的炮灰。

福間良明將日本經歷過「戰爭體驗」者分成四派（世代）：1.「戰前派」是

- 1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台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 2 藍適齊，〈言語能力がもたらした「罪名」——第二次世界大戰で戦犯となった台湾人通訳〉，楊承淑編，〈日本統治期台湾における訳者及び「翻訳」活動——植民地統治と言語文化の錯綜關係〉（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12，頁281-323）。
- 3 根據加藤邦彦，〈台湾關係 陸海軍別軍人軍属の被徵用者数等〉，《一視同仁の果て—台湾人元軍属の境遇》（日本東京：勁草書房，1979.05），頁81，如下所揭示表格為1948.04.18厚生省發表。

	身分	復員	戰病死	計
陸軍	軍人	64,237	1,515	65,752
	軍屬	50,918	16,854	67,772
海軍	軍人	14,050	631	14,681
	軍屬	47,674	11,304	58,978
合計	軍人	78,287	2,146	80,433
	軍屬	98,592	28,158	126,750
	計	176,879	30,304	207,183

指敗戰時三十歲以上，這個世代的知識分子多受過自由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洗禮者。2.「戰中派」是指敗戰時二十歲左右，青春精神的形成期與戰爭期重疊，深受軍國主義思想洗禮者。3.「戰後派」敗戰時十歲左右，他們的戰爭經驗多聚焦在空襲經驗與疏開經驗。4.「戰無派」即是戰後才出生者。⁴以殖民地台灣的情況而言，周婉窈認為因為1937年到1945年之間戰爭的動員，強力改造台灣人，所謂「戰中派」的這一群人深受皇民教育與愛國思想的洗禮，又與日本人同處一個戰場同生共死，在物質條件匱乏與盟軍的空襲逃難的過程中，他們似乎建立了模糊民族分際，形構成為生命共同體，產生獨特的對日情感結構。⁵換言之，「世代」的差異決定了他們參戰的形式，代際差異影響了他們歷史記憶的建構／重構的方式，及對戰場、戰爭心理的揣摩並留下不同的深刻性。

同樣地台灣作家的戰爭經驗亦有其代際之別，非均質的存在。例如在1895年前後出生的過渡世代作家賴和，在中日戰爭爆發後轉而致力於舊詩文創作，太平洋爆發前又因「治警事件」入獄，身心備受壓力，當時這個世代已過不惑之年實難動員，為平穩殖民地民情，他們的言行舉止備受官方監視，有人只好選擇遠赴中國另謀出路。1910年前後出生的日語世代作家也近而立之年，正值創作高峰期，但他們並非日本「國民」，無需接受徵召從軍，多以派遣作家的身分在島內「觀看」或想像海外戰地生活，配合國策描寫戰爭總動員下的生產活動與島內志願從軍的景況。1925年前後出生的跨語世代作家，卻有多位經歷戰時學徒出陣或被動員服役，甚至前往南洋戰場。戰爭的歷史傷痕直接銘刻在他們的「身體」，例如：鍾肇政（1925-2020）因瘧疾失聰，陳千武（1922-2012）手部殘疾等。

梅家玲認為戰爭的記憶與敘事，最關鍵的或許還不是戰爭如何被記憶、誰在

4 福間良明，《「戰爭體驗」の戦後史 世代・教養・イデオロギー》（日本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9.03），頁8。

5 周婉窈，〈「世代」的概念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史的研究（代序）〉，《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3.02），頁1-13。

敘事？而是站在什麼位置上記憶與敘事？⁶的確，有了「位置」才能有歷史詮釋權，進而決定怎樣的戰爭記憶才得以在國家的戰爭記憶敘事中成立。戒嚴時期台籍日本兵的戰爭記憶敘事卻長期受到官方政策的壓抑，中華民國政府因外交利益的考量，原台籍日本兵的賠償問題成為外交利益交換的籌碼，他們一再地被所謂的「國家」（日本／中華民國）背叛。戰後，使得他們的戰爭創傷記憶隨著年歲漸長而日趨風化，直到九〇年代台灣史學界才試圖搶救他們的「記憶」，讓他們在公開的研討會中有現身／獻聲的機會。然而，其中盡是他們作為戰爭創傷者的控訴和他們的「可悲傷性」。⁷為什麼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才有他們講述戰爭記憶與歷史敘事的「位置」？因為這攸關台灣後殖民主體重建和歷史集體記憶重構的問題，在這個歷史縫隙中他們的參戰經驗才得以見光出土。本文將在「戰爭之框」中探討戰爭的記憶與集體創傷，如何藉由傳記書寫與小說「再現」（representation），清理「戰爭遺緒」（war legacies）的課題。

這群殖民地出身的台籍日本兵在進行戰爭記憶敘事之前，首先得面對語言的挑戰。他們大多接受完整的日語教育，書寫語言以「日語」為主，因此大多數不會說、寫中文，只能用日語來表達，即使有機會闡發內心的苦楚，也難以完整表達。就經驗和語言而言，他們可以說像是個殖民母國「失落的部落」。⁸更何況戰後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充滿政治禁忌，「日語」是前殖民國的語言，實難有機會在公領域發聲清理戰爭與殖民的雙重傷痕。九〇年代之後在口述歷史計畫的訪談與座談會的現場，才混雜母語、日語、中文針對過去的戰爭記憶進行「自我翻

6 梅家玲，〈後戰爭（postwar）〉，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台灣理論關鍵詞》（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03），頁 157-165。

7 「可悲傷性」（grievability）一詞是轉引自藍適齊的論文〈可悲傷性・「戰爭之框」與台籍戰犯〉，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07），頁 396-397 中，作者引用 Judith Butler 提出「戰爭之框」（frame of war）的概念，藉以詮釋在戰爭進行中，社會規範如何再現「暴力」和「苦痛」（suffering），進而「認可」（recognize）—但同時也否定—某些生命其「可悲傷性」（grievability），進而賦予這些生命生存的「價值」。作者借用 Butler 的概念，生命的「價值」並非是先驗性的，是需要被建構的。

8 周婉窈，〈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1937-1945）〉，《臺灣史研究》2卷1期（1995.06），頁 125。

譯」或「被翻譯」，整理成「中文」的記憶文本。⁹因此，本文將選擇磯村生得在日自身以「日語」書寫的戰爭記憶文本為題材，探討他如何借用「日語」重述個人的生命記憶和建構台籍日本兵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及其記憶文本的社會性意義。

磯村生得（いそむらせいとく）原名柯生得，1921年台灣台中州出生，進入彰化商業專修學校後，1943年志願進入「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接受技術與軍事訓練。結訓後，1943年9月以日本海軍「軍屬」¹⁰的身分參與太平洋戰爭，前往婆羅洲的日軍101海軍燃料廠服役。日本敗戰後被虜，之後經歷一段逃亡歲月。於1947年2月才乘坐日本的引揚船「芝巴德號」被遣送到日本廣島宇品港，下船後他選擇在日依親。197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後，隔年歸化為日本籍。七〇年代末重新拾筆撰寫二戰在南洋的從軍經驗。磯村並非專業作家，卻是目前極少數戰中世代在日以日語撰寫台籍日本兵的戰爭經驗者，就其「在日」的書寫位置和戰爭記憶敘事的時間點，皆有其特殊性。

本文首先利用前行研究說明，戒嚴時期島內台籍老兵議題在台的報導情況，並針對磯村自傳性文本《青春不再來——台湾人の從軍記》、《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或る台湾人軍属の記録》（1981）在日的寫作動機、作品的出版背景，及其後續效應，即這段戰爭記憶如何被重寫（rewrite）並被回收重新編排置入台籍日本兵集體記憶中，磯村的戰爭記憶敘事的特殊性及其歷史意義，究竟為何？磯村在日出版個人自傳《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或る台湾人軍属の記録》後，又以非虛構寫實的手法，雜揉個人經驗刻劃經歷戰火洗禮的台籍日本兵的類型性人物，拼貼出所謂的「記憶小說」（fictions of memory）《少年達の戦場——台湾

9 例如：鄭麗玲採訪撰述，《臺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07）；蔡慧玉編著，吳玲青整理，《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11）；周婉窈主編，《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01）。

10 戰前日本軍隊的位階依序是：軍人、軍馬、軍犬、軍鴿、軍屬、軍夫。軍屬與軍夫一樣並未配給槍械，主要從事重勞力的苦工與搬運等工作。因此目前台灣人的戰場記憶敘事者，以「軍屬」身分講述者居多。

人元軍属の挽歌》（1984）一作，試圖建構他們的集體記憶，藉此回應長期被壓抑的台籍日本兵的戰爭記憶。最後探討這部記憶小說如何被建構？並揭示這本戰記小說的特殊性。而這些在日生產的記憶文本重新翻譯回台灣時，在當代去殖民的論述中究竟完成怎樣階段性的戰爭記憶敘事？

二、解嚴前台籍日本兵的報導

成田龍一將日本戰爭像的系譜分成：在戰爭漩渦中講述戰況時期（1931-1945）、講述戰爭「體驗」時期（1945-1965）、以「證言」的方式講述戰爭時期（1965-1990）、講述戰爭「記憶」時期（1990年以後）。體驗、證言、記憶是三位一體的，只是隨著時間的風化、世代的遞移而出現比例的差異。¹¹ 台灣戰後因語言轉換與政治因素的關係，以「證言」方式講述戰爭者並不多，¹² 大多以講述戰爭「記憶」居多，以父執輩所轉述記憶為題材，改寫成小說作品，例如：陳映真、宋澤萊等人，但他們的戰爭記憶敘事僅止於文學中的個人記憶。

五〇年代之後在台灣媒體上可以散見有關台籍日本兵從南洋各地歸台的報導。最早 1954 年 4 月 14 日於《聯合報》刊出在印尼莫洛泰無人荒島上的六位原住民被引渡至日本，但其中只有一位返回台灣。接著，又有流落在菲律賓、泰國、香港、越南、印尼各地的台籍日本兵陸續返國與家人團圓，並宣稱期待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報導中他們的「抗日」叛逃與叢林生活成為記者撰文的重點，並將他們見證戰爭的經驗「國族化」。1956 年起《聯合報》記者也持續追蹤報導他們的返台生活，特別是他們返台後發現，妻小戰後因生活困苦被迫改嫁，他們的返台竟成為一種「打擾」，因而陷入尷尬的家庭悲劇，記者以極具戲劇張力

11 成田龍一，〈「戰後」後からの問い〉，《「戦争経験」の戦後史—語られた体験／証言／記憶》（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10.02），頁 12。

12 戰後第一代作家在跨語成功之後，在中文文本中曾積極處理過台籍日本兵經驗題材，例如葉石濤、陳千武、鍾肇政、廖清秀等人。

和渲染性的筆觸描寫他們的「烽火大悲劇」。¹³

另一起則是攸關台人戰爭精神創傷的系列報導，即是自 1965 年起《聯合報》以各種標題，追蹤報導被遺忘在澳洲精神病院的台籍日本兵陳有德返台前、後的情況。¹⁴然而，當時台籍日本兵的戰爭創傷症候群在台灣社會並未受到太大的關注。概括而言當時有關台灣殘留日本兵的新聞報導或電影，試圖建構一種台籍日本兵的集體記憶：即是台籍日本兵極度可憐，因被迫強徵、滯留海外未歸、返家後家庭破碎等悲劇性，透過報導文字或影像敘事，將全部戰爭罪責簡單地歸諸「萬惡的日本軍」，¹⁵強調他們在戰爭之框中的可悲傷性，並將他們的戰爭經驗化約收進戰後中華民國的「抗日」記憶和國族認同中，不再追究他們過去的「日本兵」身分。

然而，實際參與戰爭的省籍戰中世代作家，經歷近二十年的跨語學習，直到六〇年代中後期才慢慢開始出現以「中文」寫出自身戰爭記憶的作品，雖然「文字障礙／猶如一道堵牆矗立在前方／拓荒者披荊斬棘／刻苦奮鬥／毅然向它挑戰」。¹⁶在戒嚴時期他們仍依循抗日敘事的脈絡見證「個人」的戰爭經驗，然而作品中前進南洋參與戰事本身的細節卻鮮少被憶及，或是採用另一種異國情調式的修辭稀釋戰爭殘暴的場景，將戰爭的創傷改以宗教生命哲學式的方式談論生死。¹⁷

13 楊文喬，「第四章 台籍殘留日本兵的歸來（1956-1984）」，〈選擇下的記憶：台籍日本兵歷史的「國族化」（1945-1979）〉（台北：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頁 59-89。

14 《聯合報》的第 3 版自 1965 年 8 月 30 日至 1966 年 3 月 8 日止至少有 45 篇有關陳有德自澳洲精神病院返台歸鄉的過程。後續在 1966 年 6 月 15 日在《徵信新聞報》（第六版）仍可見其發病，縣長張豐緒前往探病的消息。日本研究者中村江里的論著《戰爭とトラウマ—不可視化された日本兵の戦争神経症》（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2020.04）主要探討戰爭總動員下和戰後原日本兵的戰爭創傷，並未擴及殖民地原日本兵的議題。原台籍日本兵的病症與戰爭創傷議題，陳有德的相關報導應該是值得關注的個案。

15 同註 13，頁 87。

16 張彥勳，〈拓荒者——自傳〉，《張彥勳詩集：朔風的日子》（台北：笠詩刊社，1986.02），頁 9。

17 彭瑞金主編，〈由詩人桓夫蛻變的小說家陳千武——論台灣小說的異數《獵女犯》〉，《陳千武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07），頁 245-246；吳慧婷的〈記實與虛構：陳千武自傳性小說「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系列作品研究〉（新竹：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認為這部自傳性小說的虛構遠大過於寫實。

1974年年底在印尼摩羅泰島的叢林中發現中村輝夫（李光輝，史尼育唔）引起日、台大批媒體的關注，被稱為「最後一位」殘留日本兵。相對於日本對此議題的冷處理，台灣媒體卻大幅報導甚至出版了四本以他為報導對象的書籍。¹⁸在日的《台灣青年》也於1975年2月特別編輯了「中村輝夫專輯」以示聲援。1975年在日的台灣同鄉會副會長王育德等人與明治大學宮崎繁樹教授協力策劃，並敦請活躍於日本政壇的有馬元治（1920年在花蓮出生），成立「台灣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台灣人原日本籍士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之後簡稱「思考會」），正式展開台籍日本兵的求償運動。王育德傾其全力串連他在台北高校時期、東京大學時期的同學校友、職場同事和關心此議題的在日友人等人際網絡，投入這個運動。海外民間團體經十多年的努力，1987年日本政府才通過「關於對台灣住民戰歿者遺族之弔慰金等之法律」（獲得每人二百萬日圓的慰問金）。但在法院的訴訟卻一再敗訴，1992年最高法院作出最後裁定敗訴後，台籍日本兵在法理上並未獲得該有補償，「思考會」也隨之解散。¹⁹這樣的求償運動最終雖然未能如願獲得該有的外交補償，但台籍日本兵的問題卻因此引起台、日社會高度的關注。旅日台籍日本兵亦以這場社會運動為契機，重新召喚他們共同的戰爭記憶，在日的這場補償運動和訴訟也觸發磯村生得撰寫自傳和小說的動機。²⁰另外，後述的灣生加藤邦彥之所以投入台籍日本兵的追蹤報導和出版文集，亦源自於這場求償運動。

戰後的日本社會更早就曾大量湧現從「受害者」的創傷敘事，卻引起廣泛的批判和討論，因為舊日本帝國對外侵略的歷史罪責，在盟軍占領時期因經濟

18 楊文喬，「第五章 最後的殘留日本兵——中村輝夫」，〈選擇下的記憶：台籍日本兵歷史的「國族化」（1945-1979）〉，頁88-127。

19 陳鈺琪，〈王育德與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台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20 磯村生得在他的《少年達の戦場——台湾人元軍属の挽歌》（磯村生得發行，1984.06）的〈執筆するにあたり〉的第一段就提及昭和57年（1982）2月16日牧上裁判長宣判「雖令人同情，但依法無據」補償訴訟案宣告敗訴。在法律上雖然敗訴，但磯村仍奮筆疾書，希望為這群因戰爭命喪異鄉的台灣少年兵寫下鎮魂曲，以了卻多年的心願。

快速成長而長期被忘卻，轉而強化日本人作為被占領者與核爆的受害者的敘事，瑪麗安·赫什將這種之後才被建構出來的記憶知識被稱之為「後記憶」(postmemory)。²¹ 橋本明子認為在戰後日本社會由於其道德規範扭曲，日人的戰爭觀盡是令人感到諷刺，以至於形成相互矛盾的創傷敘事的土壤。戰爭記憶經過了數十年它們以各種形式深深地銘刻在日本國民的情感中。日本的軍事行動或政治行動是否正確？敗戰是屈辱抑是幸運？產生各種的詰問，對於這些創傷敘事的評價也不盡相同，日本未來要何去何從仍未有共識。然而有關日本戰後的創傷敘事，大致可以歸納三種敘事模式：第一種類型是，強調陣亡的國家英雄故事。這類的敘事是基於「幸運的失敗」的論點之上，藉由後見之明為他們因戰爭和國家的犧牲辯護，聲稱今天的和平與繁榮是建立在他們的犧牲之上，藉此培養國民的國家光榮意識，消弭國家挑起戰事和敗戰的罪責。第二種敘事模式，提倡對敗戰中的被害者表示同情和認同。這種敘事強調「災難性」形塑日本人亦是戰爭受害者的形象，而忽略日本帝國身為加害者的罪責。第三種敘事，強調日本在中國、朝鮮半島和東南地區實施的帝國侵略和剝削等這類犯罪行為。這種敘事除了以調查性新聞、新聞媒體、紀錄片、老兵的回憶錄和口述歷史等，也致力於東亞和解的民間活動與友誼組織。八〇年代日本老兵開始撰寫回憶錄和證言來表達自我生命經驗，其撰寫動機相當複雜，追悼亡者或透過追悼亡者來撫平個人的創傷，緩解自身因倖存而產生的心理負擔，通過重憶創傷來克服戰爭創傷。²² 然而，「在台」的台籍日本兵在戒嚴時期根本沒有自我表達撫平戰爭創傷的可能，他們戰爭經驗甚至成為政治禁忌，唯有「在日」的台籍日本兵才被賦予撰寫回憶錄的言論自由。然而他們多隱身在日本社會的各個角落，「在日」的磯村生得即是其中之一。因求償運動的展開，讓島內外的台籍日本兵重新集結，思考討論台籍日本兵

21 所謂的「後記憶」是指那些沒有經歷過事件本身，但在成長過程中深受其影響的人，產生的一種對精神創傷的想像式理解。見橋本明子著，李鵬程譯，《漫長的戰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中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9.08），頁32。

22 橋本明子著，山岡由美譯，〈敗戰の傷跡と文化的記憶〉，《日本の長い戦後 敗戦の記憶・トラウマはどう語り継がれているか》（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2018.01），頁10-13。

的戰後課題，開啟新的戰爭記憶敘事的可能，磯村也在這個的運動中出版他的相關著作。

三、戰爭記憶的自傳書寫與複述

戒嚴時期身處台灣的台籍日本兵因為語言和政治因素，鮮見個人戰記出版。磯村生得因求償運動的關係，個人的戰爭記憶重新被喚起，進而自覺地背負起講述台籍日本兵戰爭經驗的責任。然而，他的自傳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如何被傳播與複述，在這個過程中又出現怎樣的版本差異？這些差異又具有怎樣的文化意義呢？

磯村於 1978 年在日出版自傳記憶文本《青春不再來——台湾人の從軍記》，係因自費出版，最初所訴諸的對象以日本的「個人」讀者為主，「希望透過我笨拙的紀錄，作為默默無聞死去的戰友的鎮魂曲，並將直接返台而沉默無言的同胞的心情，即是能夠傳達給日本的讀者些許也好」。²³「希望他們透過一位青年的紀錄，理解他所想控訴多年青春消逝的沉重。讓更多日人理解以帝國軍人軍屬的身分被送入死地，戰敗後卻被日本拋棄的諸多同胞之事。」²⁴由於自費出版的《青春不再來》受到關注，因此他進一步增寫內容，改由時事通信社出版進入一般的書肆流通。

這個出版計畫最初的擬題是《棄てられた皇軍——台湾人元軍属の挽歌——》，（被遺棄的皇軍——台灣人原軍屬的挽歌）磯村特別在日本的蓬萊會出版的《台への架け橋》中介紹梗概。²⁵其中他特別提及生死與共的同胞呂傳信、陳汝霖，

23 磯村生得，〈この本を読んで下さる方々に〉，《青春不再來——台湾人の從軍記》（日本東京：自費出版，1978.08），頁 1。

24 磯村生得，〈おわりに〉，《青春不再來——台湾人の從軍記》，頁 149。

25 根據磯村生得的〈棄てられた皇軍——台湾人元軍属の挽歌——（梗概）〉，山本良一編，《台湾への架け橋》（日本茨木：蓬萊會關西支部，1981.03），頁 297-306。一文的文末說明：「磯村生得著『棄てられた皇軍』東京都千代田區日比谷——三時事通信社刊 昭和五十六年三月発行」，可知原計畫的書名與實際刊行的書名不同。本筆資料由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班蕭亦翔同學提示相關資料，在此誌謝。

陳在比亞克戰役喪生。據說當時日軍玉碎時，身無寸鐵的軍屬們脫隊逃難，好不容易找到岸邊的大發動艇準備離島之際，卻遭到敵機擊沉，最後唯有日人軍屬游上岸，此役台籍日本兵近三千人陣亡。又，作者與呂一同在押解澳洲俘虜時，呂因空襲轟炸在叢林中喪命。日本敗戰後軍屬們成為戰俘，他藉機逃亡幸運地受到當地華僑吳水生協助，進入當地農園工作，同時也遇到台灣農業義勇隊的同胞，疲於流浪生活的他最後選擇接受遣返。這篇概述中磯村特別強調同袍與戰地生活，對他而言當下活著的自己，「並不是存活，而是逃死」。這個「逃死」至今最大的意義，莫過於將這群台籍日本兵的戰爭體驗寫下來。在這篇文章中夾雜當時「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負責人原賀定一的短文。²⁶原賀是拓南工業戰士的訓練所精神訓練講師，備受尊崇的師長，戰後 1969 年初次受邀來台，日後多次來台拜訪學生。在他的短文〈磯村君のこと〉中卻提醒：日本今日繁榮的背後有著這群人被捨棄的尊貴犧牲，²⁷顯然如上述橋明所指出第一類型戰爭創傷敘事模式，聲稱今日的和平是建築在他們的犧牲之上。

最後，該書以《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或る台湾人軍属の記録》（1981.04）為名出版，書籍所訴諸的對象，擴及整個日本社會與日本政府。自費出版的《青春不再來》與公開發行的《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²⁸的內容雖多所重複，但詳實不一。前者以傳記主的生命經歷為主，後者則側重「軍屬」同袍和拓南生在戰場的傷亡和處境等相關描述。這本自傳中主要描寫自己志願從軍的緣由，但在前往南方戰線途中，遭逢魚雷攻擊，從血染的海水中被救起死裡逃生。不久又感染瘧疾被送至療養所治病。由於前往溫泉療養所養病，而逃過比亞克島玉碎一劫。又

26 原賀定一 1905 年出生於台北，本籍熊本縣玉名郡，1926 年於臺北師範學校公學師範部演習科畢業後，1926-1934 年任職於臺北台北市大橋公學校，1934-1941 年任臺北基隆市瀧川公學校（1941 年更名為國民學校）。1941 年轉任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的主事。晚年自傳《拙い思ひ出》（自費出版）。

27 原賀定一，〈磯村君のこと〉，山本良一編，《台湾への架け橋》，頁 299。

28 筆者在蒐集文獻時，發現台灣的鴻儒堂竟在台經行政院新聞局審議翻印出售。（東吳大學圖書所藏的版本，蜂矢宣朗贈），書帶留存的書腰標題：「棄てられたニッポン兵の軌跡」，封面顏色亦有所不同。顯然這本自傳也在台灣的日語市場流通。

在巴里巴板島面對敵軍轟炸、登陸，甚至參與押解戰俘的工作。書中他特別提到台灣軍屬因遵從日本軍官的指示，對戰俘執行剃鬚羞辱之舉，日後這些軍屬因而成為 B、C 級戰犯，甚至被處死刑。²⁹ 文本也一再描寫在戰場上瀕死邊緣的士兵與台灣軍屬的慘狀，臨終前他們在痛苦中叫喊著父母和妻子的名字，並非「天皇陛下萬歲」，藉此駁斥戰時媒體與皇民教育的愚民與虛無。

另外，這本傳記的章節為了符合出版需求行文較為精簡，主題明確。自費版只寫至他離開亞彭島乘坐遣返船隻抵日為止，但公開版在最後新增「朝鮮人復員兵」、「華僑會」、「東京にいる弟のもとへ」、「十年目の帰郷」（「父母との再会」、「残されるもの」）等段落。除此之外，為了讓一般讀者能夠順利進入文本脈絡，加強這本自傳文本的紀實性，編排了多張舊照片和個人證件照片，甚至描寫出征前參加友人結婚儀式，補充台灣殖民地的「改姓名政策」，戰時末期成立的「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的編制和主事者原賀定一一併介紹說明。《青春不再來》中並未提及求償問題，只呼籲日本政府應該正視曾為日本帝國出生入死的舊殖民地的台籍日本兵問題，但公開版的《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或る台湾人軍属の記録》的「おわりに」（結語）中，呼籲日本不應該忘卻為日本而戰，為日本而死的原台籍日本兵。³⁰

當時的求償運動，日本政府不予理會，中華民國政府不願追討，他們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磯村自傳在日出版的最大意義即是——歷史的見證者自行「發聲」，強化求償運動的正當合理性。他透過書寫召喚個人記憶，進而召喚原台籍日本兵的集體記憶，揭露他們的戰爭創傷與時代悲劇。磯村在記憶的消化與取捨的過程中，藉由「日語」將記憶化作「文字」，除了留下台人軍屬的戰地記憶之外，他也為戰中世代留下被殖民者的戰爭創傷記憶，希望讓那些已逝的生命，因

29 李展平著，《前進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台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08）一書針對 11 位台籍戰俘監視員進行口訪記錄。

30 磯村生得，〈おわりに〉，《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或る台湾人軍属の記録》（日本東京：時事通信社，1981.04），頁 230。

他的記憶得以延續，成為台灣戰爭記憶的一部分。

磯村的自傳出版後，黃昭堂（Ng Yuzin Chiautong）隨之為他撰寫書評介紹，其中除了介紹作品梗概之外，特別指出作者之所以選擇旅居日本，是因為戰後初期台灣社會暴亂，深懼遭蔣介石政權報復殺害。儘管作者在撰寫的過程中參閱了已出版的讀物，他的記憶力仍相當驚人。因為連一位軍屬手記皆無，因此從這本書可知大戰中台灣人軍屬的狀態。³¹ 肯定了這本記憶傳記出版的價值。

1999年《世界週報》的「BOOKs」重新介紹這本傳記，其中如下介紹傳記主：

柯生得自己寫出一介台灣平民，大日本帝國臣民、日本軍屬，以磯村一男之名前往南方的最前線，徘徊在生死之境的紀錄。雖然是台灣人，但卻是一位打從心底想對日本盡心的男子的波瀾半生，以情感節制的筆觸，刻劃出戰爭的悲慘和愚蠢。

（中略）

磯村的敘述口氣到底是冷靜的，對於把他被送上戰場的日本，他並非直接怒氣相向。而是反覆地書寫理解台灣、對台灣人軍屬溫情以待的日人將校和士兵的回憶，讓磯村的心情比日本人還更像日本人。

並非高調地批判戰爭，其冷靜地觀察的敘述口氣，反而成功地達到這本書的撰寫目標，在了解台灣人民對於日本的複雜情緒的意義上，是相當有趣的。³²

誠如上述村井將磯村的自傳化約為「親日」之作，顯然欠缺殖民反省和對被殖民者同情的理解。

戰爭記憶與戰爭創傷密不可分，里奧·艾汀格（Leo Eitinger）曾研究過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並描述被害者與旁觀者之間的利益衝突：「戰爭和被害者

31 Ng Yuzin Chiautong, 〈われに帰える祖国なく—或る台湾人軍属の記録〉, 《台灣青年》250號(1981.08), 頁19。

32 村井, 〈ある台湾人軍属の波乱の半生〉, 《世界週報》(1999.02.09), 頁67。底線為筆者標示。

是社會想要忘掉的，遺忘的面紗覆蓋著所有的痛苦與不悅。受害的一方或許想遺忘，但是卻無法遺忘；旁觀的一方有著不自覺的強烈動機要遺忘，而就真的遺忘了。這種矛盾對雙方而言，經常是十分痛苦的。但在這場無聲且不公平的對話中，輸家依然是最荏弱的那方。」³³ 戰後的日本是試圖遺忘戰爭的一方。二戰的戰爭創傷記憶在日本可以被視為「國家創傷」（national trauma）被理解闡述，有些戰犯甚至進入靖國神社被祭祀；但台籍日本兵的「國家」一再的轉變。戰爭期間他們雖為「天皇」而戰想要成為「日本人」，但戰後卻成為「棄民」成為歷史幽靈，他們無處傾訴自己的「戰爭創傷」，直到台灣民主化後其戰爭記憶才逐漸從潘朵拉的盒子被解禁、被「翻譯」，再生產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論述的題材，他們的戰爭經驗逐漸被出土，有別於抗日、國共內戰等，成為台灣社會戰爭記憶的另一部分。「創傷」（trauma）對戰爭世代而言是極為重大的課題，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以精神分析學對「創傷」曾做出定義：

一種經驗如果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心靈遭受非常高度的刺激，以致於無論用接納吸收的方式或調整改變的方式，都不能以常態的方法來適應，結果最後又使心靈的有效能力之分配，遭受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之為創傷的經驗。³⁴

《失落祖國的人》的序文中，作者一再強調戰爭創傷記憶：「戰後五十年，我現在一方面觸痛長期深藏於心中的傷痕，一方面將把曾經溺在時代激流中的個人經驗，由記憶中整理出來，寫成一本書。」、「能完成這本書，可以說實現了劫後餘生的我長久以來的宿願。讓我藉此緬懷踏上不歸路的戰友，同時由衷地祈求遺族們的健康與幸福。」、「謹以我這份不很精美的紀錄獻給淪為沒有祖國之

33 Judith Lewis Herman（朱蒂斯·赫曼）著，楊大和譯，〈第一章 被遺忘的歷史〉，《創傷與復原》（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07），頁15。

34 Sigmund Freud（佛洛伊德）著，葉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新論》（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01），頁264。

民冤死的戰友，做為他們的鎮魂譜。同時也希望能夠代表雖然回到台灣，但從此緘默不語的同胞，多少傳達我們當時所處的心境。」³⁵ 作者藉由重憶戰爭創傷來悼念他的同胞，透過書寫緩解他大難不死的愧疚感。同樣地日人的戰記作者，也同樣打算為死去戰友的代言，這樣的想法雖然狂妄，但仍希望繼續寫下去，因為戰記是生者打從心底的哀悼，也是個人的墓誌銘。³⁶ 因戰爭創傷而崩潰發狂者，並非離開戰場才發作，在戰場上士兵面對飢餓、敵軍的空襲、熱帶蟲蛇與瘧疾等壓力，發瘋選擇上吊、投河自盡者尋求解脫者，時有所聞。³⁷ 同樣地在《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也描寫到台籍日本兵面對敵機多日無情的轟炸時的崩潰狀態：

台灣出身的戰友橋本忽然大叫大鬧起來。由於連日不斷的空襲和艦砲射擊，導致他因神經衰弱而發瘋。砲擊最猛烈時候，最初同胞們在壕溝內使力地壓制臉色發青的他，受不了而從同胞的手中掙脫，由防空洞飛奔而出，全然無法制止。

傍晚，砲擊停歇時，同胞到洞外搜找時，橋本已被炸死。

（《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頁134，此段內容由筆者翻譯，文責自負）。

戰場上生死一瞬間，目睹戰友因難以負荷戰機轟炸而發瘋致死的場面，在磯村的記憶裡也反覆迴盪令他難以忘懷，他和其他戰記作者一樣，試圖透過書寫悼念逝者，讓自己產生某種書寫療傷作用，同時也有助於我們一窺倖存者的秘密，闡釋記憶書寫的歷史意義。畢竟，戰後有關台籍日本兵自身直接撰寫的戰記並不多，因此，磯村的著作便很快地受到關注，並接受口訪。

35 磯村生得（柯生得）著，李英茂譯，〈寫給讀者〉，《失落祖國的人——一位台灣日籍老兵的血淚回憶》（台中：晨星出版社，1996.02），頁3-5。

36 石長真華，〈はじめに〉，《フィリピン敗走記——兵士の見たルソン戦の真実》（日本東京：光人社，2003.01），頁3-4。

37 宮澤縦一，《傷魂—忘れられない従軍の体験》（日本東京：富山房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2020.08），頁33。

（一）在日的〈青春不再來〉

磯村生得自費出版《青春不再來》之後，加藤邦彥也隨之出版《一視同仁の果て—台湾人元軍属の境遇》（勁草書房，1979），其中收錄了他對磯村的訪談內容。加藤邦彥是1935年出生於台灣的灣生，1946年被遣返回日本。京都大學經濟系畢業後，於一家藥廠擔任經理之職。1970年以觀光名義來台探訪父親戰前學校的同事李西科，經他口述得知當年被迫從軍服役的96人中，僅有五人倖存。這次的訪台經驗激發他撰文報導戰後台籍日本兵處境的使命感，希望將這段「台灣人被迫從軍的血淚史」公諸於世。³⁸

1974年開始前後四次來台進行台籍日本兵的田調口訪，希望藉此揭露戰前動員口號「一視同仁」的虛妄性。採訪期間據說他每隔兩週就發表一篇相關的文章於《朝日新聞》（東京）的社會版上，讓即將風化的日本殖民地台灣支配的事實公諸於世。經筆者調查唯找到1978年4月28日他於東京的《朝日新聞》刊出以〈台灣原日本兵的傷痕至今仍深〉和〈拍桌責難日本／極貧中喘息的戰傷者和遺族們／「為富不仁」〉的報導，其中加藤說明他之所以投入原台籍日本兵調查的原由和探訪遺孀、家族、殘疾原台籍日本兵的情形，並記述他們戰後艱困的生活。³⁹

加藤來台的田調報導在台也引起相當大的迴響，報社不斷接到原台灣軍屬的電話，願意提供加藤資料，加藤也因此收到許多軍屬遺族的信件等，讓他驚覺日本與台灣之間處理戰爭後續問題的鴻溝。他選擇了鄧盛、傷殘的高砂族的バーヤン・タイモ（馬雲輝）、台灣少年工楊紹南、柯生得等人作為他的報導對象。其中，《一視同仁の果て—台湾人元軍属の境遇》的第四章〈青春不再來〉報導

38 根據筆者的管見在《聯合報》上刊有兩則有關加藤邦彥來台田調的報導〈大戰期間區台胞服役 受犧牲者未獲補償 加藤撰文代鳴不平〉，1978.04.29，3版、梅瓊安專訪，〈忠實報導日本軍閥當年迫害痛史！加藤邦彥來華搜集資料・發願找回日本人的良心〉，1978.07.10，3版。

39 加藤邦彥，〈台湾人元日本兵の傷跡いまでも深く〉、〈机たたき日本非難／極貧にあえぐ戦傷者や遺族ら／「金あっても道義なし」〉，《朝日新聞》（東京朝刊），1978.04.28，29版。除此之外，同一版面亦刊有〈フリーライターが記録づくり〉（作者不詳）介紹獨立報導人加藤邦彥致力於記錄台灣人戰爭犧牲者的身影。

了磯村生得的戰時際遇。兩人主要是因楊紹南的介紹。紹南兄長楊紹東自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結訓後，被送往菲律賓不幸戰死。但，家屬從未接獲日本政府任何聯繫，楊紹南輾轉聯絡上同是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出身同船的磯村生得，並獲得協助。

加藤摘錄了磯村贈與的自傳《青春不再來》，裁剪成該書的第四章〈青春不再來〉，其中分成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召集往南（召集南へ）、ビアク島にらず（比亞克島未歸）、故國喪失、逃亡、三人の逃亡兵、望郷やみがたく（望郷難耐）、苦力の末路、南海のデラシネ（失郷者）、さらば故國（再見故國）等小段描述磯村的戰場經歷。加藤主要側重個人經歷的說明和情感記述，在節錄逃亡徬徨無助的段落內容時，加藤還特地提到「日軍慰安婦」的問題，說明在戰場上軍方如何依軍階差異配給慰安婦。但經筆者核對發現：磯村在《青春不再來》並未特別說明提及軍中慰安婦的問題，只提到當地原住民女性從事慰安婦的工作，見敗走的日軍竟公然招攬男客的簡單對話。然而，1981年公開版的《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的〈バリックパパンに死す〉（〈死於巴里巴板〉，頁103）才提到無論軍官、軍屬都會使用軍的慰安所，只是因軍階有別，將校在俱樂部使用從日本內地招攬而來的娼妓，日人下士官以下則使用朝鮮和台灣出身的「月明莊」和當地人與荷蘭混血的「桂林莊」和「千鳥莊」。加藤雖然參考磯村的《青春不再來》，但卻增添有關戰地慰安婦的描述。這些補充轉而影響磯村之後出版的《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的內容。由此可知，磯村的自傳記憶與加藤的報導內容是相互影響的，即是《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的自傳記憶部分藉由他者的戰爭敘事所補充建構而成。

（二）在台的〈柯生得：失落祖國之六十年〉

《消失的1945台灣拓南少年史》（2004）主要是收錄「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三期12位拓南生的口訪紀錄。該書出版的動機，是因為作者之一的吳淑真1988年陪同祖父吳旦文先生出席「拓南同學會」，才認識這群拓南生，進而投身搶救

他們的戰爭記憶，讓這些記憶得以從歷史地表浮現出來。有關這本書的出版，作者提到兩位關鍵性人物，一位是第一期機械科班長黃震雄，由於他在戒嚴時期努力建立訓練所的學生名冊，並積極舉辦同學會，另外他們也參與王育德等人組織的「思考會」所發起的「台灣人戰死傷補償請求訴訟」活動。「拓南同學會」與日本國內戰友會組織並不盡然相同，他們在戰地雖然是同袍，但在台灣他們更強調在「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的同窗之誼。

作者在重新釐清這群拓南少年在訓練所的生活和學習時，除了參考口述者的回憶之外，也參考原賀定一的回憶錄《拙い思ひ出》（自費出版）。顯然作者重構台灣拓南少年史集體記憶的過程中，疊加了在台日人原賀定一的殖民地記憶，戰後因原賀的多次訪台進而強化凝聚了這個同窗會社群團體的向心力。原賀戰後來台主要的目的是探訪學生，對於當年將四百餘名拓南生送往南方，三十多年音訊杳然，自忖未善盡責任，備感自責。不只原賀如此，早瀨節男曾任教於花蓮，戰後舊地重遊看到過去阿美族的學生杜朝仁，他因戰時以少年飛行兵的身分勇赴前線而受傷。身為教師的他也代表日本國致上慰問之詞，對日本政府戰後未能善後同樣深感歉意。⁴⁰

磯村生得因旅居日本，除了熱心地前往日本厚生省抄寫戰亡名冊，也協助同學找尋相關文件，以展開求償活動。⁴¹ 吳淑真為撰寫此書，專程前往日本東京拜訪第二期生柯生得（磯村生得），並以〈柯生得：失落祖國六十年〉⁴² 記錄之。

在這篇專訪文章中，直接讓「柯生得」現聲，誠如前述講述個人經歷，其中特別強調「失落祖國六十年」的認同問題，磯村說到：「在我內心裡，台灣才是我的祖國，命運種種，使我成為日本人，失落祖國的痛苦是很深的。」⁴³ 在這篇訪談稿側重於磯村在戰爭中的移動經歷，然而柯生得為何需要強調「失落祖國

40 早瀨節男，〈左手首の傷跡〉，山本良一編，《台湾への架け橋》，頁 296。

41 吳淑真、吳淑敏著，《消失的 1945——台灣拓南少年史》（台北：力和博原創坊，2014.08），頁 65。

42 同註 41，頁 150-159。

43 同註 41，頁 159。

的痛苦」呢？口訪者並未深入追問。或許是因為在日本敗戰後，日本已不再是他的宗主國，台灣島內發生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導致他對中華民國政權顧慮甚深，同時也不斷地思索「和平究竟是什麼？國家對一個人而言究竟是什麼？」⁴⁴最後，他不得不選擇日本離散，成為一位沒有「祖國」的人。

1991年在台灣由李茂英譯出《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或る台湾人軍属の記録》的中文版，並由晨星出版社出版《失落祖國的人——一位台灣日籍老兵的血淚回憶》，中、日文版書籍的內容大致相同。由於作者在中、日文版本中所訴諸的「讀者」不同，因而書名、序文與後記略有調整。唯日文版的最後附有學者後藤乾一的解說提供日本讀者戰時的歷史背景，增加可讀性，但中譯本並未譯出。據說這本書當時銷售了五千多本，也讓磯村有了繼續撰寫的信心。

四、戰爭集體記憶的複寫與重構

台灣在解嚴後本土化重建歷史記憶的過程中，清理台人的殖民地記憶、戰爭記憶成為我們當前重要的後殖民課題，然而這些戰爭記憶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在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社會記憶理論的核心論點提到：記憶是具社會性的，我們回憶的時候會想起他人，也要依賴他人的回憶。社會記憶形成有兩層意涵：首先，它產生於集體又締造了集體。其次，個人記憶屬於群體記憶；人不是單純地活著，人們是在與他人的關係中，進行回憶的。因此，在重新理解台籍日本兵的集體記憶時，亦必需關注他們戰爭記憶的社會性，及其記憶建構的時代背景。然而，記憶內容與歷史內容畢竟有其根本性的差異，歷史記憶是分析性的、批判性的、理性的，集體記憶是流動的、易變形的，而且不斷地夾雜某個社會群體的傳統。集體記憶是由多面的群體記憶所構成的，而歷史則將過去統一成某一種記憶。集體記憶是口頭的，而歷史是書面的。歷史開始的地方，正是集體記憶結束的地方。記憶是會變形的，不同的消化與取捨的過程，對於理

44 磯村生得，〈棄てられた皇軍—台湾人元軍属の挽歌—（梗概）〉，山本良一編，《台湾への架け橋》，頁306。

解記憶來說還來得重要。⁴⁵ 在重新審視理解台灣人的戰爭記憶時，除了參照在台的口述歷史之外，本節將聚焦在日出版有關台籍日本兵的相關記憶材料等，畢竟日籍士兵與台籍軍屬同處一個戰場，他們究竟在戰記中如何「記得」彼此，重新建構他們的集體記憶？⁴⁶

磯村在日出版自傳後，特別委請《中國時報》駐東京特派員余阿勳（1935-1983）協助發文〈誰曾被日軍強迫當炮灰 請將資料提供參考 旅日華僑要出書揭發軍閥暴行〉刊於《中國時報》，⁴⁷ 徵集曾被日軍徵調的台籍日本兵的經驗談和資料等，希望藉此揭露日軍在戰場上的暴行。他利用這批資料以非虛構寫實的手法，雜揉個人經驗將人物典型化，刻劃經歷戰火洗禮的台灣軍屬和少年兵在戰場上的處境，寫出小說《少年達の戰場—台湾人元軍属の挽歌》（磯村生得發行，1984）一作。

（一）戰爭記憶的複寫

九〇年代《少年達の戰場—台湾人元軍属の挽歌》由李英茂（1929-）譯為《少年上戰場——台籍日本軍屬的少年悲歌》在台出版。⁴⁸ 譯本的〈序文〉幾乎全譯自日文版的《少年達の戰場》的「執筆するに当たり」（執筆之際），唯增補三小段，其中一段提到：

45 Parrick Geary（帕特里克·格里）著，〈作為記憶的歷史〉，羅新主編，《歷史、記憶與書寫》（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05），頁 137。

46 在台籍日本兵有關戰場傷亡情景的記憶敘事，由於台日同屬一方一起經歷死亡前的恐懼。同樣置身在菲律賓戰場的台籍日本兵潘來和（1927-）在回憶敗逃的過程中，遭美軍空襲掃射時，身旁兩側的日本同胞皆被射死，他所幸毫髮無傷。「曾聽說」美軍登入馬尼拉舊城區，將躲避在地下室的日軍以水淹的方式殲滅。這段日軍戰爭慘狀也殘留在被殖民者的戰爭記憶敘事。楊文喬等人撰，〈九死一生的菲律賓戰場回憶——二戰老兵潘來和〉，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編，《台灣兵：重尋一段被歷史遺忘的血淚青春》（台北：國家人權委員會，2022.04），頁 133-137。

47 余阿勳，〈誰曾被日軍強迫當炮灰 請將資料提供參考 旅日華僑要出書揭發軍閥暴行〉，《中國時報》，1981.10.02，3版。

48 磯村生得著，李英茂譯，《少年上戰場——台籍日本軍屬的少年悲歌》（台中：晨星出版社，1998.11）。

死者小出周次（六十三歲，名古屋市昭和區出身），一個京大畢業，擔任過大藏省及銀行要職的人，為何到此時才在菲律賓深地自殺？。……結果判明了逼小出氏於死罪的背後，雖是依軍律而行，但的確有假藉命令連續處刑台灣少年兵的種種事實。

「小出周次」這個名字也曾出現在小說中，是日軍往北呂宋山區潰逃時最後領軍的中隊隊長，也是下令處死主角的主官名字。但，作者豈會以真名示人？待筆者進一步確認《朝日新聞》（東京版，1980.07.19）發現有一則〈わが魂は比国の土に 元日本軍將校ルソンで自殺 単身移住戦友弔う日々〉的報導，人名卻是「高宮亭二」而非「小出周次」。又，高宮在自殺前便曾自費出版自傳《ツゲガラオーある青年主計士官の愛と生と死》（《朱格茄勞——某位青年主計士官的愛與生死》，自費出版，1970），之後又改成小說《ルソンに消ゆ》（《消失在呂宋》）似乎預言了他的埋身之處。高宮亭二的自傳《ツゲガラオーある青年主計士官の愛と生と死》的第一頁寫上「本書獻給 太平洋戰爭犧牲的菲律賓人／在比島作戰陣亡的將士／及台灣少年隊的諸君」，書中提及在菲律賓戰地的台灣少年隊的處境，為他們在日本帝國的戰爭史上留下隻字片語。

高宮亭二（1916.10.9-1980.7.13）1930年高等文官考試行政科合格，1931年自京都大學法學科畢業，由拓務省錄取以主計將校身分進入軍中服務。當在日本敗戰時成為美軍的戰俘，1946年在菲律賓除役返國，1948年任大阪堺稅務署長。1969年他重返菲律賓悼念戰友和探訪戰爭期間結識原住民女友，但當時女友已逝只能前往墳前表達歉意。隔年高宮出版《ツゲガラオーある青年主計士官の愛と生と死》一書，但作者並非以第一人稱撰寫，而是以「秋葉主計士官」為主角進行戰地回憶。日本「八月媒體界」的戰爭敘事在戰後五〇、六〇年代多以日本（核爆遭難等議題）的「受難敘事」為主，直到七〇年代後媒體才逐步將目光轉移到東亞地區，出現「戰爭加害」的主題，在報章媒體上報導東南亞民眾講

述日軍的侵略罪行，日本的戰爭「加害者」身影才日漸浮現。⁴⁹ 這一部自傳小說因而成為紀錄片「傷あとの証言」的拍攝底本，曾於 1975 年 3 月 21、22 日在東京 12ch、CBC、MBS 上播放，同年 6 月才正式出版《ルソンに消ゆ》（《消失在呂宋》）。

《消失在呂宋》同樣以「秋葉主計士官」為主角人名，小說內容更動之處不多，主要進行段落順序的調整，小標的修訂和增添補充幾位作中人物，唯在《消失在呂宋》將前作〈性病に〉的段落刪除。友人在小說的後記提到：「國家的賠償雖結束，但我的償還仍未了。」⁵⁰ 高宮之所以選擇呂宋島獨居憑弔友人，不外乎是為自己在戰時的殺戮暴行贖罪，正視個人的戰爭創傷。畢竟他在二十多歲就直接面對生死的極限狀態，將激烈的戰地經驗銘刻在靈魂深處，戰後一直等待可以說出來的時機，此時藉由出版戰記悼念這群戰爭犧牲者在天之靈。另外，他也多次參與日本在菲律賓的遺骨蒐集活動。⁵¹ 然而最後，他竟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他在菲律賓的贖罪歲月，原因令人費解。⁵²

小說主角「秋葉主計士官」在菲律賓戰場主要負責調度糧食和慰安婦等軍隊

49 米倉律，〈アジアからの眼差し、アジアへの視点：1970年代〉，《「八月ジャーリズム」と戦後日本—戦争の記憶はどう作られてきたのか〉（日本東京：花伝社，2021.07），頁 109-133。

50 上条志郎，〈高宮さんのこと〉，高宮亨二，《ルソンに消ゆ》（日本東京：白馬出版社，1975.06），頁 193。

51 高宮亨二，〈最後の遺骨収集に参加して〉，《中部財界》336 號（1976.03），頁 116-117。

52 根據《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を考える》會報 9 號，1980.09.22，7 版。收錄於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日本東京：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1993.06）的資料〈台湾少年兵の処刑〉的報導提到高宮亨二在菲律賓自殺事件引起社會震驚，因此朝日新聞名古屋本社社會部派遣三位記者進行追蹤報導，以期確認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會報中整理轉載《朝日新聞》系列報導的大標題「戦地ルソンに死す日本軍将校の 35 年」，從昭和 55 年（1980 年）8 月 11 日到 15 日連載如下五回：〈現地に戻りの日々 慈善重ねつつ戦友の霊弔う〉、〈台湾少年の処刑も記述 悲愴な体験をノートに残す〉、〈しょく罪の旅を重ねる 帰国から 30 年うずき続く心〉、〈この土に還りたい 帰国の誘いに微笑し応じず〉、〈償い果たし人生に決着 風化を拒んだ戦場での体験〉。但經筆者重新查閱現存的《朝日新聞》名古屋本社の「市内版」，發現其它四則的標題並未更動，但第二則標題竟改為〈傭人たちの処刑も記述 悲愴な体験をノートに残す〉，為什麼「台湾少年」變成「傭人たち」箇中原因不詳，「傭人」是高宮遺物筆記中被處刑的代稱，標題雖然更動但內文卻相同，使用「傭人」一詞，顯然報紙想要淡化動員台灣少年兵的罪責。從親人與友人的訪談中，高宮對戰爭的負疚感很深，因此選擇在北呂宋自殺似乎其來有自，排除他殺的可能性。

後勤補給的工作，因而他才有與當地的菲律賓人和肩負生產調度糧食的台灣少年隊有所交集，進而記錄他們在戰地的處境。小說中作者描寫戰地異國戀情、戰火下的生離死別，日軍敗走撤退的過程，詳述敵軍的炮擊和游擊戰、調度戰地慰安婦、虐殺台灣少年兵等的細節，甚至自剖人在戰場上的情慾、面對死亡的恐懼與厭世、自責等心理狀態。當日本敗戰日軍投降受擄後，他特別記下這群從台灣被運送到戰地的皇國少年：「從土格茄勞到巴安，年僅十五歲前後的台灣少年隊中，忍受體力極限的重度勞動，逃出 30 名，其中 5 名被處死，戰死的十幾名，當初前後 135 名的少年們，90 位生還。」⁵³ 1945 年 9 月 7 日與他們道別，以個人的身分對他們表達歉意，期許他們在日後的人生因為這場試煉而更加堅韌，但這份歉意直到七〇年代才有機會透過文字公諸於世。經由紀錄片和小說的傳播發揮了它的影響力。磯村經由這部小說得知台灣少年隊的戰爭記憶敘事，擷取部分直接轉化成《少年達の戰場》撰寫材料。

1944 年 12 月 15 日太平洋戰爭末期美軍登上岷多羅島（Mindoro），又於 1945 年 1 月 8 日晚美軍利用夜色掩護，從呂宋島北部的凌牙茵海灣砲擊，9 日清晨大舉登陸，迫使日軍陷入窘境。美軍且戰且進，在菲律賓的住民和華僑游擊隊的引導下，在馬尼拉進行為期三週的巷戰，雙方死傷慘重。日軍在南部戰線的掩護下，沿山區向北撤退，據守北呂宋山岳試圖建立防線準備長期抗戰。1945 年 4 月 26 日日軍在北呂宋抵抗中心的碧瑤為美軍攻克後，日軍餘眾撤退無路而往北部呂宋山區逃竄。1945 年 7 月 5 日麥克阿瑟將軍正式宣告菲律賓解放戰爭結束。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 月 2 日日本正式在美國主力艦米蘇里號上，向盟軍統帥麥克亞瑟簽署投降書。翌日有「馬來亞之虎」之稱的日本派遣軍司令山下奉文自北呂宋山區向碧瑤的美軍司令投降，一起投降的殘軍約有兩萬多人。⁵⁴ 菲律賓是二戰期間日軍（含軍屬）死傷最慘重的戰區。

53 高宮亨二，《ルソンに消ゆ》，頁 159。

54 陳烈甫，〈第九章 三年的淪陷歲月〉，《菲律賓的歷史與中菲關係的過去與現在》（台北：正中書局，1968.07），頁 215-246。

然而，磯村並未涉足菲律賓戰場，因此《少年上戰場》中有關在北呂宋山岳的敗逃過程的描寫，經筆者的版本核對，其實幾乎都參考《消失在呂宋》的內容，包括台灣少年工的戰地經驗，主要是借由高宮的戰爭記憶所建構出來的。包括文字情節的幾乎都是援引或改寫自高宮的小說內文。菲律賓戰區糧食運送不易，加上美軍魚雷的攻擊導致大量軍用物資石沉大海。戰爭末期日軍為了逃避美軍的空襲砲擊，而往內陸深山敗走，大規模的軍隊移動補給不易，出現軍糧嚴重短缺的問題，日本官兵隨即陷入飢餓地獄中，餓死人數遠比戰死人數還多。士兵為求生存掠奪當地農民糧食，導致農家陷入苦境，甚至發展成「食人肉」的戰爭悲劇。⁵⁵日軍為了長期占領要求屯軍「自活」，但誠如《少年上戰場》中的描寫，對農家出身的他們來說，農耕作業並不難，卻因游擊隊的襲擊和敗逃，實難原地等待收成確保穩定的軍糧補給，日軍在撤退的過程除了掠奪當地農家糧食，有人甚至違反軍紀強暴當地婦女而引發眾怒。

在糧食掠奪的過程中，手無寸鐵的台灣少年工主要負責後勤搜括運糧的工作，即使飢腸轆轆他們仍得依令將糧食運送至本部。這群台籍少年工在戰場上平時只能以少數的玉米粒和鹽巴維生，幾乎長期處在飢餓的狀態中，難耐者和日本士兵一樣成為「餓死」的英靈。⁵⁶在高宮的小說側重描寫台灣少年兵因逃跑被處刑或因傷病去世者為主；但磯村的小說卻側重「飢餓」的描寫和台灣軍屬的受虐情況，其中包括少年處刑斬首的殘酷場景。

《少年達の戰場》出版後，許世楷也為之撰寫〈書評〉，⁵⁷ 主要仍是介紹小說情節內容並抒發己見。他認為這本小說是根據磯村和他人的戰地體驗記所撰寫

55 石長真華，《フィリピン敗走記——兵士の見たルソン戦の真実》一書，作者以假名進行敘事，部分內容因為攸關生存者和戰歿者的名譽，因此以「虛構」的方式處理。

56 藤原彰，《餓死した英霊たち》（日本東京：筑摩書房，2020.07），頁 15-16。作者直言因為日本陸軍只研究戰術而不考量補給的相關問題，造成大量日軍被孤立在南洋島上因而出現大量餓死的問題，作者以瓜達康納爾島戰為例說明慘況。

57 許世楷，〈書評 磯村生得《少年達の戰場——台湾人元軍属の挽歌》〉，《台灣青年》296 號（1985.06），頁 24-30。

的作品，雖深具臨場感，但是其中有關白人女性與日本軍官情色的描寫和不時穿插的主角與華僑女性的戀愛橋段，顯得相當虛假不實。由於《消失在呂宋》也同樣出現秋葉主計與當地原住民女性的戀愛橋段，甚至論及婚嫁，但因日軍潰逃最後無疾而終。磯村似乎有意仿效之，以全知的敘事觀點，鋪陳烽火中的戀愛故事貫穿其中，即便磯村個人也曾因戀情，萌生結婚定居南洋經營農園的想法。戰爭末期逃逸台籍軍屬選擇與當地女性婚戀定居者，似乎時有所聞。⁵⁸ 但由於磯村偏重人物的形塑與刻劃，⁵⁹ 側重人物的從軍經歷和以戰況發展的情況，而忽視情節安排的合理性，例如正次獲救被釋放的理由也似乎皆有些牽強，猶如一般通俗小說般他竟被華僑游擊隊三擒三縱。

許世楷認為相較於自傳小說《失落祖國的人》，《少年上戰場》誠然欠缺扣人心弦之處，若是為了推廣直接以小說的形式書寫即可。唯小說出版時正值台灣元日本兵・軍屬問題訴訟之際，因此這本書具有很重要的參考資料。書中具體處理了台籍日本兵當中台灣少年工、特設勤勞團、從軍看護婦等，皆是戰爭末期台灣人海外從軍的主要代表類型。因此，若將這本小說放置於當時在日的台籍日本兵的求償運動脈絡中理解，將自有其時代意義與代表參戰者證言的重要性。

戒嚴時期台籍日本兵的參戰經驗等相關議題，幾乎無法在公共領域作為社會議題被公開討論。磯村身處日本，利用高宮亨二的《消失在呂宋》中有關台灣少年兵等的相關戰爭記憶敘事，改寫成《少年上戰場》中的部分情節內容，因此，小說中陳述的戰地描述，乃是由日人軍官與台籍日本兵共構的台人在菲律賓戰地參戰的集體記憶，同時九〇年代出版的中譯本，也重新被回收，成為台灣戰爭集體記憶敘事的一部分。

58 費聲蜚，〈亂世姻緣 烽火餘生歸故土 舊侶分道有新偶〉，《聯合報》，1956.12.10，3版。

59 磯村生得在〈執筆するに当り〉中曾提到：本書的資料來源，全源自於中華民國七十年（昭和五十六年）十月二日，台灣的新聞《中國時報》的協力，主要從台灣有從軍經驗者募集而來的體驗記。本書是利用他們的紀錄寫成的非虛構小說，主人公吳正次、正子姊弟、翁明恭、林信次等登場的台灣青年，讓他們各自代表同世代多數參戰者的人物經歷。（《少年上戰場》，頁5-6）。

（二）台灣人戰爭集體記憶的特殊性

日本占領菲律賓三年八個月，由日本陸軍第十四軍主導，相較於其它東南亞占領區，該區是人力與物力耗損最大的戰區。根據菲律賓政府戰後的統計，占領時期菲律賓人死傷人數超過 100 萬人。日本軍方動員的人力約有 625,800 人，其中八成約 498,600 人戰歿。美日激戰地區菲律賓的國民更深受波及，另外，占領期間因日本的軍事統治動員，嚴重剝削菲律賓的人力與物力、限制言論自由等。雖然，日本帝國高舉大東亞共榮圈的大義名分，占領初期獲得部分菲律賓政治領導者的支持，但因為日本高壓軍事統治，最後民心轉向，反而期待美軍歸來，這樣的轉變也深深地影響菲美戰後的政經關係。⁶⁰

菲律賓戰區 1944 年 7 月 28 日增兵改編成第十四方面軍（尚武集團），其中台灣軍人軍屬合計有 1,935 人，死亡人數軍人 159 名，軍屬 225 名，共 384 名，失聯者 7 名，狀況不明（死推）670 名，復員者共 874 名。菲律賓地區也是台灣軍人軍屬犧牲較多的地區。⁶¹ 以從現存台籍日本兵寄自戰地的明信片資料為例，大致可知他們一到戰地後，都得先改成日本姓氏，敗逃入山後又得不斷地更換部隊，特別是遭遇空襲後因人員死傷等問題，不得不重新整編，例如根據柯太郎 1944 年 10 月 11 日寄回台灣的明信片，原隸屬日軍比島派遣威 2944 部隊，之後進入守下部隊榎田隊服役，一個月後改隸柴崎隊，最後 1945 年病歿魂喪比島。⁶²

《少年上戰場》的主角吳正次和台灣少年隊等在敗逃的過程中，不斷被重新整編，且因中隊隊長的領軍風格的差異，被對待少年兵的方式亦不同。然而，軍中內部實際的情形，或許只能在記憶小說中才容許被「再現」。因此，希望將《少

60 池端雪浦，〈フィリピン現代史のなかの日本占領期〉，《日本占領下のフィリピン》（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99.07），頁 1-21。

61 許文堂，〈君在何方？——太平洋終戰時期台籍日本軍人軍屬的分布〉，《臺灣風物》71 卷 2 期（2021.06），頁 25-74。

62 謝仕淵，〈從馬尼拉寄來的明信片〉，《Watch Taiwan 觀·臺灣》26 期（2015.07），頁 51-53。

年上戰場》⁶³ 這本小說集重新置入日本帝國的戰爭之框中，相較於其它日人的戰記，它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和特殊性？以下分成幾點說明：

1. 菲律賓華僑的游擊抗日

1941年12月8日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後，同時也入侵菲律賓。隔年1月2日攻占首都馬尼拉，隔天進入軍政時期。日軍占領菲律賓之後，在華僑社會大舉逮捕抗日分子，旅菲僑民以商人居多，大多聚居城市。日軍占領馬尼拉後，有些屈作順民以求苟活，但有遁居鄉間，有些甚至逃難到北呂宋山岳地區。華僑地下愛國組織主要的任務，是引導美軍進入首都，保持僑社的鬥志，使漢奸知所斂跡並供給相關情報，由於地下游擊隊人員不多，訓練裝備不足無法正式作戰，但因他們瞭解地形，出沒無常，可以蒐集到有關敵軍佈署的情況。⁶⁴

在菲律賓馬尼拉有不少台灣軍屬，因為語言的關係較易與當地華僑溝通交流，只要未做出傷害日軍的事，日人並不會限制台人跟華僑溝通。⁶⁵ 但，1941年7月英美在南洋下達資產凍結令，被引揚遣返的台民路經廈門召開座談會，任職於馬尼拉市台北出身的會計員李華嶽曾提到：「台灣同鄉會成員僅十二名，但卻受到當地華僑組織抗敵會很大的壓迫，不知有多少回大罵冷不防地毆打說『台灣人腳踏日本籍和支那籍兩條船，東洋的猶太人。』」⁶⁶ 顯然，戰時臺灣總督府有意想要利用台灣人的漢族身分滲入南洋僑界，但當地僑界顯然對台灣人的日籍身分保持警戒充滿敵意。《少年上戰場》中大篇幅地描寫戰爭末期台灣軍屬與菲律賓華僑游擊隊的互動情況，是小說重要的情節之一。作者為何選擇處理這樣的題材？或許是因台籍日本兵口述資料的內容，或是磯村逃亡期間曾受到當地華僑社

63 以下內文所標示頁碼將以公開出版的中文版《少年上戰場——台籍日本軍屬的少年悲歌》和《失落祖國的人》的頁碼為主。

64 陳烈甫，〈淪陷時期的華僑〉，《菲律賓的歷史與中菲關係的過去與現在》，頁229-242。

65 鄭麗玲採訪撰述，〈莊賜川——菲律賓軍政幹部〉，《台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頁95-99。

66 作者不詳，〈マニラに於ける臺灣人の活動〉，《臺灣日日新報》，1941.10.07，3版。報紙的姓名本為「李峯嶽」，但經鍾淑敏教授賜教應為「李華嶽」，在此誌謝。

會庇護經驗有關（《失落祖國的人》，頁 180-240）。

小說主角吳正次一抵達馬尼拉就到華僑開設的店家用餐，埋下他日後與華僑游擊隊之間互動線索，在軍隊潰逃激戰的過程中他屢次被勸降，他卻因承諾會將台灣少年們平安帶回台灣，即使他原本有機會逃離日本軍營，但他仍選擇回營守護這群台灣少年兵。最後，卻因被軍方懷疑他是敵方間諜，在日本敗戰那一天被公審處決成為小說中的悲劇英雄。

接著，作者又利用小說的虛構性創造「翁明恭」這位投奔華僑游擊隊的「台灣特設勤勞團」隊長。作者將翁設定為同是大甲農業學校的學長。在行文中作者直接將口述資料縫合進小說的「歷經滄桑誰之過」（《少年上戰場》，頁 208-215）。翁明恭在志願從軍出發前就試圖逃逸，引起軍憲特別的關注，抵達戰地後被分派從事修築機場和擴建機場跑道的工作。後因日軍軍機損失殆盡，這些台灣軍屬轉而從事搬運武器和挖掘防空壕的重勞動工作，並忍受飢餓與非人道的虐待。但，真正促使他決意逃亡的原因是，軍中長官們竟謀劃讓手無寸鐵的台灣軍屬在兩軍對峙時以竹茅前進，成為陣前的自殺部隊，藉以消耗敵方軍火，美其名是提供他們為皇國捐軀的機會，但他們若折返就被視同臨陣逃亡一律射殺，希望藉此減少軍糧的消耗量。如此非人道的對待，讓他們選擇在陣前高舉白旗投靠華僑游擊隊以保全性命。⁶⁷ 在這場戰鬥中只存活三分之一的軍屬，被擄接受偵訊時，翁只能說是想活命才投降，因為他對自己深信的日本軍的可恥行徑和背叛實在難以啟齒，加入當地抗日游擊隊是他們活著返台的唯一選擇。這樣被日本帝國背叛的懊惱，在台灣戰後噤聲的年代裡他們只能無奈地封存在內心深處，等待訴說的機會，然而藉由磯村的小說讓他們的委屈與憤懣得以找到宣洩的歷史出口。

這本小說除了描寫戰爭末期台灣軍屬與菲律賓華僑的互動情況之外，也探討當地僑民的國家認同，華僑僑民一直認定中國大陸是他們的祖國，但是當時中國

67 台籍日本兵的戰地回憶錄中，也同樣地回憶日軍中隊長要求沒學過打戰的台灣少年背負炸彈讓坦克輾壓，進行自殺攻擊。李香誼，〈拓南少年戰地回憶錄（下）——紀念二次世界大戰終戰 71 年〉（來源：<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8/article/4718>，檢索日期：2022.09.22）。

分裂成蔣介石的國民黨和毛澤東的共產黨主政地區。因此，菲律賓的華僑界與游擊隊團體也分成兩個黨派，過去為了早日結束戰爭，而以國共合作的方式抗日，但日本戰敗後兩黨勢力又激烈地爭權奪利。因此，小說中的僑界領袖陳錦文雖然計劃戰爭結束後將重新經商，但仍深懼菲律賓獨立後將會有排華衝突，因此選擇移居台灣。根據駐公使段茂瀾電南京外交部的公文可知，當時流亡在菲華僑，均係淪陷期中敵軍招募來菲工作，或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前由廈門來菲避難者，總數 6588 人。1945 年 11 月 5 日到 1946 年 2 月 16 日，共分七次，先後全部遣返回國（電文：1946.09.03）。主要救濟總署駐菲辦事處向美軍駐西南太平洋總部運輸處商撥運兵船，分批遣送完畢。⁶⁸（電文：1947.06.23）。然而，小說中的陳錦文一家並非循此路徑來台，而是搭著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的日籍貨輪信義輪抵達高雄港，但卻接獲正次已故的消息結束這場戰地悲戀。

2. 「一視同仁」的欺瞞性與戰地的情誼

戰爭末期所謂的「皇民文學」中有不少描寫歡送志願軍上戰場的場景，藉此呼應國策進行徵兵宣傳，動員殖民地青年投入戰場。這群接受皇民化運動洗禮的戰中世代，期待透過前往戰場，跳脫殖民地差別體制「成為日本人」。然而，在接受嚴格的訓練上戰場後，才赫然發現「一旦來到戰地卻被怒罵『清國奴』，處處飽受歧視。」（《少年上戰場》，頁 79）。戰爭末期當日軍陷入劣勢和物資補給不足的困境時，身在前線的挖土部隊受到虐待的情況更嚴重，作者在小說中反覆地質疑「一視同仁」的欺瞞性。同時，一再出現歧視欺壓殖民地軍屬的日人官兵或軍屬，例如日人軍屬直誇本間雅晴（1887-1946）果真是台灣司令官，送來了這些年輕的苦力供軍隊差遣籌糧，讓日本軍免於餓死（《少年上戰場》，頁 152-153），或是視台灣少年的生命如草芥的中尉小出周次，或是對台灣看護助理施暴的小關廣伍長，或是嘲笑台灣軍屬「清國奴」的日人軍屬。

68 謝培屏編，〈遣送菲律賓華僑回國〉，《戰後遣送旅外華僑回國史料彙編（3）南洋·海南島篇》（台北：國史館，2007.12），頁 402-404。

然而，在小說中並非所有的日人形象都是殘暴的欺壓者，其中也出現基於人道精神善待台灣軍屬和少年兵的日本官兵，例如：剛到呂宋島時吳正次遇見親切的松島上等兵，吳正子遇到的灣生橋本靜江護理師，傾聽翁明恭訴苦的花岡博上等兵等人。這些日人幾乎都是與台灣有淵源的灣生，在戰地裡成為備受勞力壓榨歧視的台籍日本兵的救助者。小說中作者似乎採取某種平衡書寫，而非純然以抗日的角度刻劃日人形象。戰後台人供奉日人牌位或神化日人保鄉之舉建廟供奉者時有所聞。⁶⁹ 這些舉措顯然不盡然是單純的宗教信仰或親日的關係，或許可以解讀為另一種台灣人記憶戰爭的方式。

3. 語言作為國族認同的思考

台籍日本兵有不少前往南支那、南洋等地從事通譯工作，他們由於同時深諳雙方的語言有其語言上的優勢，但也最容易深陷間諜風暴。南洋戰地「福建話」是華僑社會主要的用語之一，當時蘭印的台籍人士也提及在蘭印可收聽台灣放送，「福建語」的節目也很適合當地華僑。⁷⁰ 由此可知，台灣之所以被視為日本南進基地，除了地理位置上的便利之外，台灣人的族群身分與語言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在小說文本中，作者一再強調小說人物所使用的語言，包括語言所隱含的身分認同和族群關係的喻意。

主角吳正次成長於皇民化時期，因國語運動導致「台灣話」逐漸從生活日常生活中退場，在公領域他更習慣使用「日語」進行溝通。豈知「福建話」在南洋戰地竟然成為他「談」戀愛的語言，作者藉由兩人的對話探討語言所代表的民族認同。秀蘭自陳：「我從小父母就說福建話，而日本軍還沒有來之前，馬尼拉也有福建人的學校，幾乎都用福建語說話。英語和塔加洛語反而覺得難學。我們覺得能在馬尼拉說祖國的福建語是中國人的驕傲。」（《少年上戰場》，頁 58）。對僑民而言，福建話成為他們與祖國重要象徵性的文化連結。正次對於身為台灣人卻

69 樞田猛資，〈廣枝音右衛門氏慰靈祭開催報告〉，《台灣協會報》781 號，2019.10.15，3 版。

70 作者不詳，〈蘭印に於ける狀況〉，《臺灣日日新報》，1941.10.07，3 版。

無法流暢地使用福建話感到很慚愧，但是這樣的殖民地苦悶，似乎一時也無法說得清楚。（《少年上戰場》，頁 39）

又，在戰地從事勞動工作的台籍軍屬備受日籍軍屬歧視，甚至天天遭受虐待。唯有「在休憩時間和晚上閒聊故鄉話題成為他們唯一的安慰。」（《少年上戰場》，頁 207）軍隊因台籍軍屬人數增多，常以福建話交談，竟惹來內地工人們的謾罵。顯然，在戰場上他們似乎試圖利用「福建話」建立屬於台籍人士的集體意識，發揮語言的社會性功能。小說中也刻意描寫華僑游擊隊在雙方混戰時，敵方以聲辨人發現講福建語的台灣人，便直接勸降收編（《少年上戰場》，頁 194）。另外，鄭姓少年因為私藏軍糧而遭處刑之時，在臨死前同樣以「福建話」向同袍告別。

在戰爭末期的台灣社會中福建話是「我族」的用語；日語才是公共領域帶有殖民權力的語言。但在「南洋」的戰場上「福建話」從個人私下的情感交流到戰場上的翻譯溝通，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既是蒐集戰地情資與當地華僑社會溝通的語言，亦是台灣人建立集體意識的語言。這本小說寫實地再現戰地多語的話語空間，翻轉語言的位階關係，是台籍日本兵戰記中有別於其他日人戰記的重要特徵之一。

4. 戰爭末期台灣女性的海外經驗

小說吳正次的姐姐正子為殖民地女性被動員前往戰地的類型代表。根據研究，⁷¹ 戰爭期間台灣女性約莫有一千人以上被徵調到海外擔任傷兵等照護工作。他們的身分主要有兩類型：「從軍看護婦」和「從軍看護助手」。戰爭末期台灣總督府藉由報刊的宣傳報導，出現了看護助手的志願熱潮，以志願書、血書表達志願決心與奉公熱忱，其招募的對象主要以「台灣人為主」。但「從軍看護助手」徵募的條件仍有許多限制，需符合高等女學校學歷（或同等學歷）、年齡、接受醫護訓練和軍事訓練，在通過檢定考試之後，始可派遣至海外。薪資遠比較島內一般護理人員優渥，因此吸引一批優秀的年輕女性投入戰地的看護工作。1942

71 吳欣樺，〈硝煙與白衣：日治末期的台灣從軍看護婦〉（台北：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至 1944 年日本陸軍委託台灣總督府在台灣募集三期的從軍看護助手，共 670 人，但主要送往香港、廣東的日軍醫院協助照顧救護傷患等。⁷²

1941 年基於戰局之需，軍方分別招募甲種和乙種看護婦，乙種主要是因應戰時護理人力之需，所以放寬條件限制，只要求高等小學畢業或修畢高等女學校二年級以上課程者，修業年限也縮短為兩年。隨著日軍南洋占領區的拓展，傷兵與日俱增，因此南洋戰區急需「從軍看護婦」投入，在「重金」的吸引下仍有人冒險應徵前往菲律賓服務。小說中的吳正子「在志願的名義下被迫當看護助手」，但是根據上述只有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學歷的正子，顯然只能報考「乙種看護婦」，台灣的「從軍看護助手」並未被派遣到菲律賓戰線，而是「從軍看護婦」才會被派遣至馬尼拉並於野戰醫院服務，顯然磯村將二者的身分混淆了。小說中他特別刻劃在軍隊撤退至北呂宋山區時野戰醫院的遭空襲和士兵傷亡的慘況，這些慘況日後在黃玉緞的口述⁷³也看到同樣的情景，例如在菲律賓敗走移動過程中，為了不敗露軍情而將無法移動者毒死或槍殺；美軍空襲後血肉橫飛哀鴻遍野的煉獄情景等。小說中除了「記憶」空襲中犧牲的台籍護士、灣生日籍護士橋本與台籍護士在烽火中的戰地情誼之外，也揭露軍中性暴力的問題。派遣到戰地從軍台籍女性在戰場上雖然扮演救護者的角色，卻深受戰火和性暴力的雙重威脅，更因是殖民地出身，甚至直接被貶抑為慰安與洩慾的工具，這些記述都是從軍隊內部直接控訴日軍在戰場上的性暴力。

總之，磯村試圖形塑台籍日本兵的各種典型人物，包括信守承諾的吳正次最後因被懷疑是間諜，成為魂喪異國的台灣軍屬；為了平安歸國而不得被迫叛逃投奔華僑游擊隊的陸軍勤勞奉公團的軍屬翁明恭，在戰地百般忍受苦役的林信次

72 陳柏棕，〈戰地的白衣天使：臺灣人海外派遣從軍看護助手〉，《臺灣學通訊》100 期（2017.07），頁 28-29。

73 黃玉緞口述，鄭麗玲譯寫，〈千人針——我的青春與哀愁〉，《臺灣風物》53 期 4 期（2003.12），頁 9-20。大谷渡的《看護婦たちの南方戦線—帝国の落日を背負って》（日本大阪：東方出版，2011.08）中亦有不少黃玉緞（川島繁子）等台籍看護婦和看護助手的口述資料。另外，在台日人看護婦門脇初代和平田民子因為雙親都在台灣，戰後本想回台灣但最後復員（退役）後直接留在日本迎接從台灣被遣返的雙親。

和喪命戰場的曾榮城；以及吳正子護理師助手（應是乙種看護婦），他們各自代表戰爭末期被動員到南洋的不同類型的台灣青年男女。目前有關台灣少年工的回憶錄多以戰前高座海軍工廠的少年工的相關回憶居多，南洋的台灣少年工的回憶相對較少，儘管作者宣稱這是一本「小說」，因大量使用口述歷史和既有的戰記文本，記錄派遣至菲律賓的台灣少年工和軍屬的悲慘處境，其實更接近報導文學。

四、結語

二戰結束後東亞社會仍留下許多殖民與戰爭的遺緒，但因為冷戰體制的關係，日本帝國的幽靈始終以某種形式續存。戰後台灣社會因政權更迭和戒嚴、冷戰的關係並未充分去殖民，或進行戰爭反省。戰後日本社會經濟快速成長而更急切地忘卻在舊殖民地的戰爭動員，試圖撇清殖民與戰爭的責任。成田龍一認為在檢視在日本的「戰爭責任」的同時，亦應同時思考在發動戰爭之前，大日本帝國對殖民地領有的責任，即是所謂的「殖民地責任」，然而在日本的戰後史中相較於「戰爭責任」對於「殖民地責任」幾乎沒什麼自覺性，日本政治家們的「妄言」幾乎也都出自於此。⁷⁴ 這群曾經因殖民地的戰爭動員而犧牲的年輕生命悄然被歷史的巨輪輾壓而過，他們的戰爭創傷經驗從未被國家體制承認，終其一生等待著日本帝國的道歉，但大多已抱憾而終。磯村「在日」放棄國家認同選擇「離散」，只能宣稱自己是失落祖國的台灣人軍屬，隱身在日本社會中。直到「思考會」發起求償運動後，才讓磯村找到歷史的破口，重新審視自己的戰爭經驗，進而建構台籍日本兵的集體記憶。他藉由「日語」進行台灣戰爭記憶的敘事，訴諸日本社會的輿論，期待喚起日本讀者關注這場戰後原台籍日本兵的求償運動。

七〇年代日本已進入經濟高度發展的後期，1970年高宮亨二自費出版《ツゲガラオーある青年主計士官の愛と生と死》、加藤邦彥訪台著手調查戰後台籍日本兵的境遇等，接著1974年12月中村輝夫被發現。高宮自傳的紀錄片1975年

74 成田龍一，〈「戦争経験」の戦後史—語られた体験／証言／記憶〉，頁299。

播出後改寫出版了《消失在呂宋》。1975年王育德等人組成的「思考會」成立，1978年磯村自費出版自傳《青春不再來》。1979年9月28日又受拓南生家屬（呂傳義，戰友呂傳信之弟）之託，陪同前往日本厚生省的援護局業務第二課調閱〈海軍燃料廠に関する台湾出身軍属〉（元101及び102海軍燃料廠）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出身者名簿，赫然發現自己「逃亡」的紀錄。⁷⁵1979年5月加藤邦彥報導集《一視同仁の果て—台湾人元軍属の境遇》出版。1981年4月磯村正式出版個人傳記《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或台湾人軍属の記録》。之後，他也協助吳淑真、吳淑敏在日蒐集資料，並完成《拓南少年史：探尋拓南工業戰士們的身影》（2004）一書，為這一群拓南少年留下重要的歷史身影。在思考會興訟的過程中，磯村拾筆撰寫個人從軍戰記，除了召喚個人的戰爭記憶之外，也在受訪和協助家屬蒐集戰歿者資料的過程中被召喚、被補充，揭露台籍日本兵過往的戰爭創傷，積極地以出版傳記介入這場求償運動。

除此之外，磯村也整合蒐集的各方資料，試圖創造典型人物建構「戰中世代」的集體記憶，因而寫出《少年上戰場》這本混雜疊合的記憶小說。然而，這本小說內容不只利用了在台徵集戰地體驗的相關資料而已，亦大量援引高宮的《消失在呂宋》部分內容，回收日人的戰地記憶，成為記憶小說的一部分。小說中有關游擊戰的敗走、空襲的危險、飢餓與高宮的戰記內容重疊性高，但是記述南洋華僑社會的抗日活動，台灣籍日本兵的認同苦惱、語言問題、戰地受虐與灣生的戰地情誼、台籍從軍看護婦的海外戰地經驗等，卻凸顯出台灣人參戰記憶的特殊性。經由作者以「日語」重新編織，被翻譯成為台灣戰爭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小說的文類特點主要強調，如何利用文學的虛構性凸顯歷史的真實性，但是報導文學則更強調「非虛構寫實」，強調真實性的文學敘事，作者試圖將複數的經驗透過小說的虛構性框整這群南洋從軍者的經驗。然而，磯村並非是專業作家，《少年上戰場》的寫作動機其政治目的性遠大於文學創作的藝術性，磯村試圖利用戰

75 磯村生得，〈二行に記された半生〉，《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或る台湾人軍属の記録》，頁1。

記發揮影響力，因此，作者在重新建構／協調／再建構台籍日本兵的集體記憶時，特別強調台籍日本兵的「受害者」經驗以利求償，其中包括遭「日軍」虐殺處刑、遭「美軍」空襲傷亡、遭「華僑游擊隊」偷襲射殺等，由於太過強調經驗的敘事，以至於弱化小說藝術性的經營。

另外，不可否認的是台籍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其實屬於日本帝國軍侵略者的一環，在戰地他們都得服從軍令，協助戰爭物資的生產與掠奪、搬運。在戰後政治正確的要求下，他們成為深受日軍迫害，值得同情的被殖民者或是叛逃的抗日者。在求償過程中，他們強調日本帝國背叛棄原殖民地出身軍屬的歷史責任。就個人的歷史處境，不難發現他們大多為受到改善家境、半工半讀等條件誘惑下，或師長、村里長的強力勸說動員下，以軍屬身分上戰場。在口述記錄中多強調個人參與戰事的被動性與被帝國背叛的可悲傷性，身為日本軍的協力者的戰爭責任似乎在記憶敘事中被抹除。然而若再追究戰爭的是始作俑者時，卻無法追討任何來自殖民帝國（祖國）的「歉意」，所以黃玉緞在寫給大谷渡的信中提到：「祖国でない祖国を信じ、愛したのが馬鹿でした。」⁷⁶（深信且愛著非祖國的祖國，真是愚蠢），正反映出這群曾為帝國而戰，卻被帝國背棄者的絕望感。

在虛構的「小說」中，敘事者與「戰爭」現場本身保持某種距離，身為被殖民、戰爭受害者的台籍日本兵在南洋戰場的協力和掠奪行為等，因文學全知的俯瞰視角而得以再現，同時也更貼近他們在戰地多重的真實身分，折射出另一種虛構的歷史真實性。即是，在文學的虛構情節中，反而具體地照見他們身為日軍侵略的「協力者」和殖民「受害者」雙重矛盾的身分和悲劇性。磯村生得努力以「日語」從個人記憶出發，撰文揭櫫台灣殖民地戰中世代南洋的集體記憶，在戰後台灣日語文學裡為戰中世代譜出戰爭創傷記憶的鎮魂曲，完成其階段性任務。磯村生得的日語文本成為當前台灣戰爭記憶的清理，戰爭記憶主體的重建，台灣後殖民的記憶政治論述展開的過程中，不可忽略的文化記憶。

76 大谷渡，《看護婦たちの南方戦線—帝国の落日を背負って》，頁1。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大谷渡，《看護婦たちの南方戦線—帝国の落日を背負って》（日本大阪：東方出版，2011.08）。
- 山本良一編，《台湾への架け橋》（日本茨木：蓬萊會關西支部，1981.03）。
- 中村江里，《戦争とトラウマ—不可視化された日本兵の戦争神経症》（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2020.04）。
- 加藤邦彦，《一視同仁の果て—台湾人元軍属の境遇》（日本東京：勁草書房，1979.05）。
- 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日本東京：台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1993.06）。
- 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台灣理論關鍵詞》（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03）。
- 石長真華，《フィリピン敗走記—兵士の見たルソン戦の真実》（日本東京：光人社，2003.01）。
- 成田龍一，《「戦争経験」の戦後史—語られた体験／証言／記憶》（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10.02）。
- 池端雪浦，《日本占領下のフィリピン》（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99.07）。
- 米倉律，《「八月シャーリズム」と戦後日本—戦争の記憶はどう作られてきたのか》（日本東京：花伝社，2021.07）。
- 吳淑真、吳淑敏著，《消失的 1945——台灣拓南少年史》（台北：力和博原創坊，2014.08）。
- 李展平，《前進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台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08）。
- 汪宏倫主編，《戦争與社會：理論、歴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07）。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3.02）。

- 主編，《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01）。
- 宮澤縱一，《傷魂—忘れられない従軍の体験》（日本東京：富山房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2020.08）。
- 高宮亭二，《ツゲガラオ—ある青年主計士官の愛と生と死》（自費出版，1970.11）。
- ，《ルソンに消ゆ》（日本東京：白馬出版社，1975.06）。
-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編，《台灣兵：重尋一段被歷史遺忘的血淚青春》（台北：國家人權委員會，2022.04）。
- 張彥勳，《張彥勳詩集：朔風的日子》（台北：笠詩刊社，1986.02）。
- 陳烈甫，《菲律賓的歷史與中菲關係的過去與現在》（台北：正中書局，1968.07）。
- 彭瑞金主編，《陳千武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07）。
- 楊承淑編，《日本統治期台灣における記者及び「翻訳」活動—植民地統治と言語文化の錯綜関係》（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12）。
- 福間良明，《「戦争体験」の戦後史 世代・教養・イデオロギー》（日本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9.03）。
- 蔡慧玉編著，吳玲青整理，《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11）。
- 鄭麗玲採訪撰述，《臺灣人日本兵的「戦争経験」》（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07）。
- 橋本明子著，山岡由美譯，《日本の長い戦後 敗戦の記憶・トラウマはどう語り継がれているか》（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2018.01）。
- 著，李鵬程譯，《漫長的戰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中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9.08）。
- 磯村生得，《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或る台湾人軍属の記録》（日本東京：時事通信社，1981.04）。
- ，《少年達の戦場—台湾人元軍属の挽歌》（磯村生得發行，1984.06）。
- ，《青春不再來——台湾人の従軍記》（日本東京：自費出版，1978.08）。
- 著，李英茂譯，《失落祖國的人——一位台灣日籍老兵的血淚回憶》（台中：

晨星出版社，1996.02）。

——著，李英茂譯，《少年上戰場——台籍日本軍屬的少年悲歌》（台中：晨星出版社，1998.11）。

謝培屏編，《戰後遣送旅外華僑回國史料彙編（3）南洋·海南島篇》（台北：國史館，2007.12）。

藤原彰，《餓死した英霊たち》（日本東京：筑摩書房，2020.07）。

Judith Lewis Herman（朱蒂斯·赫曼）著，楊大和譯，《創傷與復原》（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07）。

Parrick Geary（帕特里克·格里）著，羅新主編，《歷史、記憶與書寫》（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05）。

Sigmund Freud（佛洛伊德）著，葉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新論》（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01）。

二、論文

（一）期刊

Ng Yuzin Chiautong，〈われに帰える祖国なく—或る台湾人軍属の記録〉，《台灣青年》250號（1981.08），頁19。

周婉窈，〈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1937-1945）〉，《臺灣史研究》2卷1期（1995.06），頁85-125。

高宮亨二，〈最後の遺骨収集に参加して〉，《中部財界》336號（1976.03），頁116-117。

許文堂，〈君在何方？——太平洋終戰時期台籍日本軍人軍屬的分布〉，《臺灣風物》71卷2期（2021.06），頁25-74。

許世楷，〈書評 磯村生得《少年達の戦場—台湾人元軍属の挽歌》〉，《台灣青年》296號（1985.06），頁24-30。

陳柏棕，〈戰地的白衣天使：臺灣人海外派遣從軍看護助手〉，《臺灣學通訊》100期（2017.07），頁28-29。

黃玉緞口述，鄭麗玲譯寫，〈千人針——我的青春與哀愁〉，《台灣風物》53期4期（2003.12），頁9-20。

謝仕淵，〈從馬尼拉寄來的明信片〉，《Watch Taiwan 觀·臺灣》26期（2015.07），頁51-53。

（二）學位論文

吳欣樺，〈硝煙與白衣：日治末期的台灣從軍看護婦〉（台北：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吳慧婷，〈記實與虛構：陳千武自傳性小說「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系列作品研究〉（新竹：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陳鈺琪，〈王育德與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台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楊文喬，〈選擇下的記憶：台籍日本兵歷史的「國族化」（1945-1979）〉（台北：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三、報紙文章

《朝日新聞》1980.08.11-15。

《聯合報》1965.08.30-1966.03.08。

加藤邦彥，〈台湾人元日本兵の傷跡いまでも深く〉、〈机たたき日本非難／極貧にあえぐ傷者や遺族ら／「金あっても道義なし」〉，《朝日新聞》（東京朝刊），1978.04.28，29版。

余阿勳，〈誰曾被日軍強迫當炮灰 請將資料提供參考 旅日華僑要出書揭發軍閥暴行〉，《中國時報》，1981.10.02，3版。

村井，〈ある台湾人軍属の波乱の半生〉，《世界週報》（1999.02.09），頁67。

作者不詳，〈マニラに於ける臺灣人の活動〉，《臺灣日日新報》，1941.10.07，3版。

———，〈大戰期間區台胞服役 受犠牲者未獲補償 加藤撰文代鳴不平〉，《聯合報》，1978.04.29，3版。

———，〈フリーライターが記録づくり〉《朝日新聞》（東京朝刊），1978.04.28，29版。

———，〈蘭印に於ける状況〉，《臺灣日日新報》，1941.10.07，3版。

梅瓊安，〈忠實報導日本軍閥當年迫害痛史！加藤邦彥來華搜集資料・發願找回日本人的良心〉，《聯合報》，1978.07.10，3版。

費聲蜚，〈亂世姻緣 烽火餘生歸故土 舊侶分道有新偶〉，《聯合報》，1956.12.10，3版。

權田猛資，〈廣枝音右衛門氏慰靈祭開催報告〉，《台灣協會報》781號，2019.10.15，3版。

四、電子媒體

李香誼，〈拓南少年戰地回憶錄（下）——紀念二次世界大戰終戰71年〉（來源：<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8/article/4718>，檢索日期：2022.09.22）。

